

玉

器

(下)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玉器

(下)



主编：张广文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玉器 (下)

Jadeware (II)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主 编 张广文

副 主 编 扬 捷 赵桂玲

编 委 恽丽梅 徐 琳

摄 影 冯 辉

出 版 人 胡大卫

编辑顾问 吴 空

责任编辑 周祖贻 王占军

设 计 周祖贻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71 号

制 版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春湖工业区中华商务印刷大厦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规 格 大16开 (216 × 286mm) 348面

国际书号 ISBN 978-7-5323-8803-5/J·78

版权所有, 不准以任何方式, 在世界任何地区, 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图版和文字之一部分或全部。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本版图书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Condition of sale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distributed in Mainland China only.

故宮

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特邀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襄	王 尧	李学勤
张政烺	金维诺	宿 白

总编委主任委员: 郑欣淼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杜乃松	李 季	李文儒
李辉柄	余 辉	张忠培
邵长波	陈丽华	杨 新
杨伯达	单国强	郑珉中
郑欣淼	胡 锤	施安昌
耿宝昌	晋宏逵	徐邦达
徐启宪	聂崇正	萧燕翼

主 编: 李文儒 杨 新

编委办公室:

主 任:	徐启宪		
成 员:	杜乃松	李辉柄	余 辉
	邵长波	陈丽华	单国强
	郑珉中	胡 锤	施安昌
	秦凤京	郭福祥	聂崇正

总摄影: 胡 锤



总序

杨新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占地72万平方米，收藏文物近百万件。

公元1406年，明代永乐皇帝朱棣下诏将北平升为北京，翌年即在元代旧宫的基址上，开始大规模营造新的宫殿。公元1420年宫殿落成，称紫禁城，正式迁都北京。公元1644年，清王朝取代明帝国统治，仍建都北京，居住在紫禁城内。按古老的礼制，紫禁城内分前朝、后寝两大部分。前朝包括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辅以文华、武英两殿。后寝包括乾清、交泰、坤宁三宫及东、西六宫等，总称内廷。明、清两代，从永乐皇帝朱棣至末代皇帝溥仪，共有24位皇帝及其后妃都居住在这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1914年，北洋政府将沈阳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的部分文物移来，在紫禁城内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1924年，溥仪被逐出内廷，紫禁城后半部分于1925年建成故宫博物院。

历代以来，皇帝们都自称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他们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视作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宫廷内，不但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进贡来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精品和奇珍异宝，而且也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匠师，创造新的文化艺术品。中间虽屡经改朝换代，宫廷中的收藏损失无法估计，但是，由于中国的国土辽阔，历史悠久，人民富于创造，文物散而复聚。清代继承明代宫廷遗产，到乾隆时期，宫廷中收藏之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到清代末年，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两度侵入北京，横烧劫掠，文物损失散佚殆不少。溥仪居内廷时，以赏赐、送礼等名义将文物盗出宫外，手下人亦效其尤，至1923年中正殿大火，清宫文物再次遭到严重损失。尽管如此，清宫的收藏仍然可观。在故宫博物院筹备建立时，由“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其所藏进行了清点，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六编28

册，计有文物117万余件（套）。1947年底，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其文物同时亦归故宫博物院收藏管理。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战火的毁灭，故宫博物院从大量的藏品中检选出器物、书画、图书、档案共计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运至上海和南京，后又辗转流散到川、黔各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文物复又运回南京。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南京的文物又有2972箱于1948年底至1949年被运往台湾，50年代南京文物大部分运返北京，尚有2211箱至今仍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于南京建造的库房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故宫博物院的体制有所变化，根据当时上级的有关指令，原宫廷中收藏图书中的一部分，被调拨到北京图书馆，而档案文献，则另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藏保管。

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对北京本院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清理核对，按新的观念，把过去划分“器物”和书画类的才被编入文物的范畴，凡属于清宫旧藏的，均给予“故”字编号，计有711338件，其中从过去未被登记的“物品”堆中发现1200余件。作为国家最大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肩负有搜藏保护流散在社会上珍贵文物的责任。1949年以后，通过收购、调拨、交换和接受捐赠等渠道以丰富馆藏。凡属新入藏的，均给予“新”字编号，截至1994年底，计有222920件。

这近百万件文物，蕴藏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极其丰富的史料。其远自原始社会、商、周、秦、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历五代两宋、元、明，而至于清代和近世。历朝历代，均有佳品，从未有间断。其文物品类，一应俱全，有青铜、玉器、陶瓷、碑刻造像、法书名画、印玺、漆器、珐琅、丝织刺绣、竹木牙骨雕刻、金银器皿、文房珍玩、钟表、珠翠首饰、家具以及其他历史文物等等。每一品种，又自成历史系列。可以说这是一座巨大的东方文化艺术宝库，不但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艺术的历史发展，凝聚着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它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

开发这座宝库，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为社会提供了解和研究这一传统的可信史料，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我院曾经通过编辑出版各种图书、画册、刊物，为提供这方面资料作了不少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各科学术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一种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故宫文物以一窥全豹的出版物，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来得及进行。今天，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往来，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故宫。学者专家们，无论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还是从事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也都希望从故宫的藏品中发掘资料，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因此，我们决定与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努力，合作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反映故宫文物收藏的大型图册。

要想无一遗漏将近百万件文物全都出版，我想在近数十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到社会需要的同时，不能不采取精选的办法，百里挑一，将那些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约有一万二千余件，分成六十卷出版，故名《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这需要八至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可以说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六十卷的体例，我们采取按文物分类的方法进行编排，但是不囿于这一方法。例如其中一些与宫廷历史、典章制度及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文物，则采用特定主题的编辑方法。这部分是最具有宫廷特色的文物，以往常被人们所忽视，而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今天，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历史价值。另外，对某一类数量较多的文物，例如绘画和陶瓷，则采用每一卷或几卷具有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编排方法，以便于读者的需要和选购。

如此浩大的工程，其任务是艰巨的。为此我们动员了全院的文物研究者一道工作。由院内老一辈专家和聘请院外若干著名学者为顾问作指导，使这套大型图册的科学性、资料性和观赏性相结合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有限，主要任务由中、青年人承担，其中的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因此当我们刚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诚恳地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和建设性意见，使以后的各卷，能达到更理想之目的。

感谢香港商务印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忠诚合作！感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们进行这一事业的人们！

1995年8月30日于灯下

导言

张广文



清代二百六十八年间，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经历了巨大变化。其间有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融合，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有文化领域中的新探索。这些对艺术与工艺美术的发展，包括玉器的生产、使用和收藏无不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古代玉器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用玉体系和传统。明代晚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玉器的使用与收藏已相当普遍，出现了研究与收藏的热潮。明末清军南下，社会骚动不安，百业俱废，玉器生产一度低落。清王朝一统天下后，历顺治、康熙数十载，励精图治，经济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宫廷玉器的收藏、制作和使用创造了条件。乾隆时期，宫廷中更重视古玉收集，精研用法及以玉制作生活用具，宫廷玉器蓬勃发展。清宫所遗古玉及用玉，大都是在乾隆时收集整理或制作的，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嘉庆时期。清后期，民间制玉业发展，玉器生产的重点自宫廷转到民间，而宫廷玉器的生产能力及工艺水准皆不如前，逐渐衰落。

一、清代宫廷玉器的孕育

清代玉器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满族原是游牧民族，崇尚武力，靠军事力量夺取天下，建立了清政府。但是在文化方面，清统治者企图采用本民族文化同化其他民族的政策却遭失败。面对汉族的优秀文化，清统治者最终采取了承认、学习和利用的态度，使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走向融合，而两方民族的用玉传统也趋合流，出现了清代宫廷的用玉体制。顺治、康熙时期是清代宫廷玉器的孕育期，目前有关这时期玉器使用情况的文献及实物材料虽不多，但大致脉络尚可辨识。

在现存的文献中，记载康熙以前清代玉器的使用及生产情况的资料非常少。而在清代宫廷

遗玉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康熙年款的作品，显示康熙时期宫廷玉器的制作，似落后于其他类别的工艺品。因此，康熙及其以前，社会上收藏玉器和使用玉器的情况如何，清宫廷是否重视玉器，以及这一阶段玉器的生产情况，一直是古玉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

经过皇太极、顺治等时期的努力，清初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和发展。顺治、康熙年间，百业俱兴，生机勃勃，艺术品及工艺品的制造，在品种和数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尤其是康熙时期，有些工艺品的制作水准甚至超过了明代中晚期。康熙时期瓷器、珐琅器、丝织品以及家具都有表现。这些工艺品中，很多都有康熙年的制造年款，是典型的宫廷用品。就整体社会而言，玉器的使用与其他工艺品一样，是同一经济模式及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在发展上不会与其他工艺品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在清朝初年，社会上已出现了收藏古玉的风气。康熙年间，孔尚任在《享金簿》⁽¹⁾中记述了他所见和收藏的古玉，其名目有“汉玉笛”、“雷公斧”、“古玉荷叶洗”、“白玉螭玦”、“碧玉小玦”、“汉玉环”、“碧玉羊头”、“汉玉鹰扬砚”等。其中并记：“汉玉笛……予得于越人余叙庵，锦囊檀匣匣守为重宝，不啻天球矣。”1962年，在北京西郊小西天师范大学工地施工时，发现了一处康熙十四年（1675）下葬的满族贵族墓葬，墓中所葬是大臣索额图之女。随葬器物中有诸多玉器，其中有“子刚”款玉尊、花形玉佩等前代作品，也有白玉鸡心佩、碧玉鸡心佩等康熙时期作品，还有一些玉器为唐宋时所制⁽²⁾。这一墓葬中的随葬玉器并非临时应制的明器，而是索氏家族的藏玉，其中的仿古鸡心式玉佩，是清代制造的实用玉器，可能为墓主生前所佩带。这就说明清初部分满族贵族的藏玉和用玉观念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相一致，并佩用汉文化传统的仿古玉器。

在清宫遗存文物中，保留了汉文化传统的用玉观念。顺治时使用的玉溢册及玉玺，与历朝礼制传统一致，但器型粗笨，表现出使用者不求工艺雕饰而偏好玉质的倾向。清宫遗存中有“康熙十七年刘源恭造”款的贡墨⁽³⁾，这类贡墨分为三月所制及五月所制。三月所制是为康熙万寿生日所贡，墨以十四笏为一组，形态各异。有昭示天下太平者，有以龙颂德者，有珍玩秘宝之形者。其中一笏为“苍璧”，一笏为“玉佩”。苍璧墨为璧形，璧是礼器，是祭祀活动中礼天的重器。“玉佩”墨为玉剑璫之形，清代把它称之为“璫”，是宋代之后最受青睐的玉器。“璫”与“岁”谐音，常用于祝寿。刘源以玉器为墨形，为康熙生日所贡，由此可见当时宫廷对传统玉器的重视。

清宫遗玉中，有两类典型的康熙时期玉器：一类是在玉器附件上刻有御制“玉杯记”的仿古玉器。“玉杯记”为乾隆所撰，记玉工姚宗仁指认该玉杯为其祖所制，并道明烧古做旧之法。姚宗仁于乾隆初年即在造办处供职，其祖应为清朝初年人。这类带题记的玉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有三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亦存有类似风格的器物。第二类玉器以一件白玉砚盒为代表。在有款识的康熙年制砚中，有嵌玉或玛瑙的砚



盒。其中一件为钟式砚，松花石制成，砚上有白玉盖，砚下有白玉座，合成砚盒，其间几无空隙。其砚不似为配盒而制，砚、盖、座应为同时的作品。白玉砚盒上有凸雕的篆字诗句，末署“子昂”。类似风格的琢有“子昂”款诗句的玉器在宫廷遗玉中亦有见，这类作品同明代琢有文人诗句的玉雕作品不同，多数是康熙年制作的宫廷玉器。另外，明晚期文人官宦中盛行抚琴之风，影响到清初的工艺品造型，康熙年名家制墨中多有琴式墨，清宫遗玉中亦有小型的琴式玉盒，风格与一般明代玉器有别，也可能是康熙时作品。这几类作品皆有小巧精致、光泽明亮、棱角圆润的特征。上述情况说明在清朝初年，宫廷玉器已开始起步，且具有一定规模。

二、清代宫廷玉器的发展

1723年世宗继位，年号雍正。雍正之初面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复杂局面，政事繁忙，本无暇顾及宫廷玉器的收藏与使用，但由于康熙年间经济的发展与官僚体制的形成，官僚收集古玉和以玉为贡已成风气，地方玉器不断进入宫廷，致使雍正在理政之余，也收藏玉玩，装点宫室。雍正年制作的玉器，带有年款的不多，仅故宫博物院存有少量作品。目前，全国博物馆及个人收藏中，能确定为雍正时期作品的玉器数量很有限，这就给研究雍正时期玉器，尤其是宫廷玉器的使用情况带来困难。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档案中，有雍正年间各级官吏向朝廷进奉的礼单和雍正年造办处制办宫中用品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从这些档案得以了解雍正时期宫廷玉器的一些情况。

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设有多项工种，各作坊称为“作”，如铜作、漆作、匠作等，还有玉作。其中诸多作坊都作业频繁，如珐琅作制作银茶壶、漆作制作如意式黑漆盘、铜作制作天然竹节如意等。与铜作、漆作、匠作等比较，玉作的生产能力显然是十分有限的。造办处玉作所承担的活计，主要是玉器收拾、改做、刻款等小修小改项目，很少有制作成品活计。玉作活计清档所记内容，主要为收拾玉器。如雍正五年九月十一日记：“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十日，郎中海望持出青玉荷叶式双喜杯一件，白玉双圆龙头靶杯一件，青玉方形靶杯一件，白玉八角靶杯一件，青玉方形靶杯一件，白玉腰圆螭虎靶杯二件，汉玉方足靶杯一件，白玉乳丁圆形靶杯一件……奉旨：玉杯大小十件……其螭虎头有不好之处俱各收拾。钦此。”⁽⁴⁾所谓收拾，是在原作品上加以修饰，提高工艺水准。改做是将原有玉器改变形态，制成其他器物。如雍正六年玉作活计清档九月初六日记：“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白玉心猿意马一件，随紫檀木座。奉旨。将上面的猴砣去，改做笔架用。钦此。”⁽⁵⁾类似的改做玉器的活计，在造办处档案中还有许多记载。从档案中还可看出，雍正年间，造办处玉作已有少量玉器的制作，如造办处活计清档雍正五年十月十二日记：“做得银提油墩一件，随镀金靶银勺一件，共重五钱四分，郎中海望呈进。奉旨：著照此





样做玉提油墩一件，其靶子用废玉筷子做，钦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做得……。”⁽⁶⁾这里所记提油墩不知何形，银制品与银勺共重五钱四分，想必不会太大。照做的玉提油墩应属小件玉器，自十月十二日至

十二月二十三日，费时两月有余，时间颇长，可见造办处玉作的生产能力是较低的。造办处玉作是宫廷玉器的主要提供者，它所承办的活计以收拾、改做为多，只能进行少量的制作，另外还有玉器采办，以满足宫廷用玉的需要。

宫廷玉器的另一来源是地方的进贡，贡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宫中必要的日常用品；一类属珍宝玩赏类器物。在珍宝玩赏类器物中，玉器占有相当数量，这一点在雍正时期宫廷进单中有所反映。如雍正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所进器物中，就有银晶花瓶成件、百乳玉鼎成座、万年玉瓶成件、交泰玉盒成件、双喜玉罇成件……汉玉笔山成件、鸞凤玉罐成件、脂玉花囊成件、脂玉水注成件等。⁽⁷⁾郑禅宝于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又贡入类似的玉器多件，如脂玉鼎炉成座、碧玉梁卣成架、脂玉花囊成件、银晶花樽成件、碧玉花插成件、玉龙凤樽成件、汉玉笔山成件、白玉花插成件等。⁽⁸⁾前后两份进单相距不足三年。贡玉的频繁，反映出宫廷的玉器需求，也道出玉器自社会流入宫廷的情况。

目前见到带有雍正年款的玉器仅有杯、洗、碗、仿古轳轳环（图90）等，品种单调。实际上，雍正时期宫廷使用的玉器品种异常丰富，远非上述几种。雍正八年十月二十日，伊拉齐向朝廷进贡的器物中有玉器二十一件。主要品种如下：万年一统玉尊，九王一统玉尊，九如水晶尊，瑞芝碧玉尊，吉庆有余玉磬，白玉如意，碧玉如意，白玉花插，茶晶压纸，白玉图书盒，碧玉两管瓶，白玉笔洗，玉臂搁，白玉墨床，白玉水丞，白玉合符，白玉连环，碧玉花插等⁽⁹⁾。主要是陈设品和文房用品，有些还属大件玉器。从名目上看，并非“汉玉”和“旧玉”，而主要是时作玉器。这类进单显示，雍正时期宫廷玉器的使用量已很大，品种也十分丰富。

三、清代宫廷玉器的鼎盛期及其出现的原因

清中期，经济与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宫廷玉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新疆地区准葛尔部和回部的动乱，新疆玉料大量进入宫廷，解决了长期阻碍玉器发展的原料问题，宫廷玉器生产出现了繁荣局面。在乾隆时期的宫廷用玉中，新制玉器大大超过了旧玉和传世玉。玉器品种激增，大型玉陈设品不断出现，玉器皿出现了批量生产，宫廷组织生产的玉器成为用玉的主体，宫廷收藏的古玉也形成了系统和规模，使宫廷玉器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期。推动这时期玉器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社会盛行用玉、藏玉之风

纵观历史，历代玉器使用的鼎盛期，皆出现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时期。收藏与使用玉器是经济充裕后人们普遍追求的习尚，而清代康、乾时期蓬勃的经济就助长了玉器的发展。前面已经分析过，收藏古玉之风康熙时已在社会上出现，及至乾隆时期，此风有增无减，在官宦中更为崇尚，特别对一些小玉件渴求甚殷。若玉上有鲜活斑点或天然蕴色，更是身价倍增，千金难买。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有小玉件的买卖情况：“曾见贾人持一玉簪，长五寸余，圆如画笔之管，上半纯白，下半莹澈如琥珀，为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坚不肯售。”⁽¹⁰⁾“见董文恪公一玉蟹，俱不甚巨，而纯白无点瑕，独视之亦常玉，以它白相比，则非隐青，即隐黄隐赭，无一正白者，乃知可贵……以六百金转之矣。”⁽¹¹⁾从这两件小玉件索价的情况看来，当时的玉器确是价值不菲。由于古玉市场的扩大，玉器的仿古作伪及鉴别真假的研究也发展起来，有关玉器的文章、书籍相继而出。乾隆亲自撰写的《玉杯记》就是在识别玉器时的有感而发，所记着重于姚宗仁所述古玉做旧之法，又兼识别之窍门。乾、嘉之时，学术领域中考据之风盛行，在乾隆授意征集散佚书籍时，又冒出了一部署名宋人龙大渊的《古玉图考》。此书收录玉器数百件，多数器物似古非古，怪诞不经，并逐件考据，洋洋大观，言之凿凿，也反映出人们对古玉的追求和学术领域对古玉的重视。



（二）帝王崇尚，推波助澜

乾隆对古玉的收集和研究推动了宫廷藏玉的发展，他利用宫廷的财势，兴玉器收集、考据、研究、制造之事，玩玉器于股掌，置玉器于高堂而管领风骚。

关于古玉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乾隆对所知道的著名玉器，想方设法也要收罗宫中，其中以收集“渎山大玉海”最为闻世⁽¹²⁾。渎山大玉海为蒙元宫廷所制，历经沧桑而流落民间，成为道士的菜盆。乾隆使人以银易之，纳入宫廷，后又多次进行修整。乾隆收集古玉的兴致为臣下所知，不少臣属逢迎其意，广征古玉，贡入宫廷，使宫中藏玉不断增加。例如淮安关监督寅著于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所进旧玉，计有六十二件，数量不少⁽¹³⁾。乾隆初年已就收集到的古玉分类收藏，造办处档案记载了乾隆三年（1738）的一次玉器整理情况：“太监毛团、高玉交洋漆匣一件，内盛糊锦匣四十件，共盛各色玉器七百六十二件。传旨：将此箱内玉器按次序名色写一琳琅笥摺子盛在箱内。钦此。”⁽¹⁴⁾“于本月二十九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将洋漆箱一件，内盛玉器琳琅笥本纸摺一件，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此摺子不好，照宝笈摺子样做磁青纸摺子一件，壳面上写乾隆戊午集成，其玉器另着人认看名色，准时着梁诗正写。钦此。”⁽¹⁵⁾这次整理涉及的七百多件玉器虽仅限于认看名色、分类装箱、登记造册等事项，却使管理条理化、系统化，把古玉收藏纳入正轨。

其二是对古玉进行研究和鉴别。现存的乾隆御制文中有专门讨论古代用玉制度及玉器形制的《御制搢圭说》⁽¹⁶⁾和《御制圭璋说》⁽¹⁷⁾，还有识别古玉的《古玉斧佩记》⁽¹⁸⁾。乾隆御制诗中，有八百多首是咏玉器的，其中咏汉玉、宋玉、旧玉、古玉的作品占了相当数量。这些诗句及其所附注释，不仅叙述了古玉的历史，同时还指明玉器的时代、名称、用途及鉴定与评价，其中有些是十分准确的。这些并非乾隆一人之能，而是代表了当时清宫廷对古玉器识别的整体水准。在清宫遗存的明代以前旧玉器中，有很多作品或附件上带有御制鉴赏诗句，绝大多数是乾隆时期琢刻，从中显示乾隆时期对各种玉器收集、研究、鉴别的情况，为以后各期古玉收集打下了基础。

（三） 宫廷玉器生产体制加强及扩展

雍正之前，由宫廷直接生产的玉器数量不多，只是集中供应宫廷用玉。就社会整体而言，玉器生产的主流却不在宫廷。乾隆时期，宫廷使用的玉器，除古旧器物外，主要由宫中作坊制造，生产数量剧增，工艺水准也有提高，而生产供宫廷用的玉器，也渐成为玉器行业的主流。这段时期宫廷玉器生产的特点，主要是玉器生产能力的加强，并控制了玉材的来源。

据现存档案资料，雍正时期的造办处玉作，主要活计是外来玉器的改做和修饰，而在宫中琢制和采办的玉器则很少。乾隆初年，造办处调整规模，加强了玉器制作的组织管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造办处设立如意馆，选调玉匠好手进馆工作。如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五年三月的一次工匠挑选：“记事录，十一日，司库图拉郎正培奉旨，挑老诚些好手玉匠一名进如意馆做活计。钦此。于本日图拉郎正培……内大臣海望随挑得玉匠姚汉文进内承差。记此。”⁽¹⁹⁾乾隆年间，造办处玉匠不断补充，当时的苏州是南方玉器生产中心，技术力量雄厚，宫中玉匠多自苏州选入。如乾隆二十六年，“于五月二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寅著将苏州送到玉匠张君选一名……摺片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²⁰⁾造办处所用玉匠，除苏州选送外还有北京匠人、满族八旗的家内匠和回回玉匠等。有时造办处因“玉匠短少，活计甚多”通过太监胡世杰转奏，得到御批“准计外雇几个匠役成做”⁽²¹⁾而从各方临时招聘工匠。

第二，造办处承担了部分宫廷玉器的设计工作。造办处中有一批能设计玉件的治玉高手，而重要的作品就需要由清宫内奉职的画家绘图，先制小样，呈览获准后才能制作。如乾隆九年四月“如意馆……玉匠姚汉文画得节活吠虎罗汉陈设一张，呈览奉旨准做。钦此。”⁽²²⁾

第三，向各地区分派任务，动用各地力量为宫廷制作玉器。这一时





期，宫廷直接控制的玉作有十处之多，除宫内造办处玉作如意馆外，为宫廷加工玉器的有苏州织造、两淮盐政、长芦盐政等，另外江宁、淮安、九江、凤阳、杭州等地也曾为宫廷制作玉器。⁽²³⁾在乾隆的督导下，宫廷玉器的生产能力大大加强，制作数量迅速提高。乾隆三年（1738），在玉材供应短缺，玉器加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造办处奉乾隆旨意，一次就向苏州织造交白玉带板二百块，青玉带板五十四块，“传旨：着交与织造海保处，仿古款式花纹酌量做佩、璧、环、玦、合符、三四层状盒，不必甚急，陆续送来。钦此。”⁽²⁴⁾同年七月初四日苏州织造海保送抵成品二十件，七月二十七日十件，九月初二日二十件，九月二十八日二十四件，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件，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件，次年二月十九件，计有一百三十三件。一年之内，苏州为宫廷制作了玉器一百三十三件，数量远超雍正时期。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动乱尚存，玉材不能大量进入内地，玉器生产仍处于低潮，宫廷尚能如此大量制作玉器，尔后盛况更可想而知。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地区的动乱平定后，玉料大量进入内地，宫廷玉器的产量急剧增加。所制器物以陈设、日用品为主，体积较大，工艺更为复杂。据推算，此时宫廷玉器的年生产量，最高达到二百件以上。另外乾隆时期还制作了数量颇多的大件玉陈设，其中不仅有高达数尺的大插屏和仿古大玉瓶，还有重达数千斤的玉山和玉甕。乾隆四十一年之后，相继制成重逾万斤的大禹治水图玉山（图57）、玉料重约三千斤的南山积翠玉山、秋山行旅玉山、会昌九老图玉山（图58）及玉料重约五千斤的云龙玉甕等。大件玉陈设的制作，使宫廷玉器的产量和规模达到了空前的发展。

（四）新疆玉材资源丰富

中国古代制玉的主要原料为阳起石，属透闪石族矿物，这类玉料多产自新疆和田、叶尔羌地区。清代所用玉料也主要来自这两个地区。新疆玉材按采捞方式可分为河产玉及山料玉两种。河产玉又称“籽玉”，捞于河中。张世南《游宦纪闻》中记：“每逢五、六月，水暴涨，玉随流至，多寡由水细大，水退乃可取。”⁽²⁵⁾河中玉料由于随水奔流而相碰撞，有绺缝的则多已裂开，所余之材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小，多呈卵状。山料玉采自山上，玉料较大但多绺裂。著名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玉料重逾万斤，采自新疆叶尔羌密勒塔山。乾隆二十四年前，由于准葛尔部割据，控制了和田、叶尔羌地区，新疆玉料难以大量进入宫中，限制了宫廷玉器的生产。平定准葛尔部后，新疆玉料得以大量进入宫廷。据道光元年（1821）堂抄载：“新疆平定后，和田、叶尔羌一处，每年进到玉子四千余斛。”⁽²⁶⁾这段时期宫廷控制了新疆玉的开采，主要供宫廷玉器生产专用。“十八世纪清统治新疆后，官府垄断玉石开采，严禁当地群众或商民采集或贩卖玉石，每年秋季，叶尔羌办事大臣都要向朝廷呈报开采情况并进贡玉石”。⁽²⁷⁾乾隆所撰《咏和田大玉碗六韵有序》中记：“二万里溯勤拓地，德昭宵旰之筹，三十年久效劳波，心底春秋之贡，惩营私而庸臣抵罪，牟重利而市贾争趋，维谁何必谨于岩关，而甲乙究归于天府。”⁽²⁸⁾乾隆序文反映出当时官商对于玉料的态度。乾隆《乙酉题和田玉碗诗》中

又有“和田包贡岁频来”之句，说明和田之玉每年都要贡入宫内。关于贡玉的数量，宫中奏折有记，“乾隆三十年和田所属哈拉圭塔克采玉三十五块进贡”；“乾隆三十五年春，和田玉陇喀什河、哈拉喀什河采获玉石进贡的有玉一百五十八块，白玉一块重十二斤”；“乾隆三十三年秋季分和田玉陇喀什、哈拉喀什二河采获进贡玉二百二十八块，白玉一块重十五斤”。⁽²⁹⁾ 新疆地区玉料进入宫廷的主要途径是贡入，每年分为春、秋二次，从乾隆二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共五十二年，平均每年四千余斤，共计贡进内廷的玉石多达二十余万斤。⁽³⁰⁾ 另外，朝廷还依据需要，经常派专员去新疆采办玉料，乾隆年间采办玉磬材料便是典型事例。清代宫廷使用的玉磬分为特磬和编磬两种，特磬每分十二面，编磬每分十六面，所用玉料较好，而且较大。如黄钟一面“股修一尺四寸五分八厘，股博一尺九分三厘，鼓修二尺一寸八分七厘，鼓博七寸二分九厘，厚七分二厘九毫”。⁽³¹⁾ 这种玉器不能有柳裂，否则会影响磬的音色。宫廷需用玉磬多，地方贡入之玉不能满足需要，清廷便派专员赴新疆采办。乾隆四十一年（1776）“太监胡世杰传旨：问邹景德……挑得玉磬料有了无有。钦此。随据邹景德说银库内之玉，足做编磬者有，但颜色玉情不一，又兼具有柳道石性，俱使不得等语。回奏。奉旨：……将从前跟德魁去过之人派往叶尔羌办玉磬料。钦此。”⁽³²⁾ 类似的采办在乾隆朝还多次进行。由于清廷控制了玉料来源，为宫廷玉器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兼之有效的行政组织，致使宫廷玉器的生产在乾隆时取得巨大进展。

在宫廷玉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一支异军突起的痕都斯坦玉器也进入了清代宫廷。乾隆所撰《天竺五印度考讹》谓：“若夫北印度，实近我回部之叶尔羌，故叶尔羌之西，过葱岭，即拨达克山，拨达克山转而南为克什米尔，又转而西为温都斯坦……”⁽³³⁾ 清代宫廷将来自印度、土耳其及部分中亚地区的玉器统称为“痕都斯坦玉器”。痕都斯坦玉器于乾隆年间大量进入清宫内廷，有碗、盘、壶、盒等器皿及刀把、镜把、经架等用具，品种很多。“痕玉”的制造非常精致，一般具有下列特点：（1）造型奇特，呈多瓣形、叶形、橄榄形等植物形状；（2）胎薄如纸，微透明，体轻如叶；（3）装饰图案细碎繁密，满布器面，多为花叶纹；（4）镶嵌工艺精致，或嵌金线，或嵌玻璃，或嵌彩石，色彩艳丽夺目，与底色对比强烈。乾隆非常喜爱痕都斯坦玉器，使用并收藏了大量痕玉作品，还留下了约六十四首咏“痕玉”的诗句（图260、261、265、267、269），其中对某些器物的评价，甚至高于中国玉器⁽³⁴⁾。

四、清代宫廷玉器的使用

清初至乾隆时期，宫廷对玉器的需求一直上升，到了乾隆至嘉庆初年，宫廷已储有大量玉器，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种类亦甚



繁多。

(1) 册与宝

册为玉版联结而成，版上刻文记载重要事项，常见的有封册、徽册、谥册等。据《清史稿·礼七》载：“册宝初制用金，康、乾时兼用嘉玉，道光后专以玉为之。”⁽³⁵⁾除册封用途之外，还有大量刻有清帝御制诗、赞、记、题等文字的玉诗文册（图4、5）。另外宫廷重宝、天子印玺也大量使用玉制（图1-3），乾隆十三年（1748）定交泰殿二十五宝中有玉宝，而清帝所用玉制闲章就更多了。

(2) 祭祀

清代宫廷的祭祀活动很频繁，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的大祀，日、月、天神、地氏、历代帝王等中祀，还有群祀。祭祀中有祭物、乐舞、隆重的礼仪，并常常使用玉器。祭祀用的玉器有璋、琥、璧、琮、爵等，还有礼乐所用的磬。据乾隆时《皇朝礼器图式》载：璋最初用于朝日坛，“旧制朝日坛用赤璋，形制不符，且非以祀日，乾隆十三年钦定祭器，朝日坛用赤璧……”⁽³⁶⁾；琥曾用于夕月坛，“旧制夕月坛用白琥……乾隆十三年钦定祭器，夕月坛用白璧……”；璧除用于朝日坛、夕月坛外，还用于天坛正位，“本朝定制，天坛正位用苍璧”。玉爵用于太庙，乾隆十三年前还曾用于天坛正位。祭祀活动中要进行乐舞，而演奏中和韶乐，玉磬是不可缺少的乐器。据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六年曾做玉特磬，“以为圆明园、紫光阁二处乐器内换用”，“换下之玉磬着交热河乐器内换用”⁽³⁷⁾。乾隆三十七年，“再查……圜丘坛几处内旧有玉编磬三分，新造六分，系青玉新造，又朝日坛等十六处特磬系新造……”。乾隆四十年（1775），“查原奏采办宁寿宫内中和乐器二分所需青玉特磬二分计二十四面，编磬二分计三十二面”⁽³⁸⁾。这说明了圆明园、紫光阁、宁寿宫、热河文庙、圜丘坛、朝日坛等多处的祭祀礼乐活动中用玉的情况。

(3) 陈设

清代宫廷陈设品中有大量玉器，而清宫档案中也称一些作品为玉陈设。不同的玉器陈设方式也各异，大型香亭、角端、太平有象等陈设于宝座台上，以增加宫廷的庄严气氛。大型玉山、玉海主要陈设于内廷，以供欣赏。花插、花觚等较小的玉器用作室内陈设，插孔中还有附置其他物品作为装饰。用于室内陈设的玉器品种非常多，包括瓶（图17-21）、壶（图110-112）、炉（图30、31）等仿古器物，还有插屏（图59-64）、奩盒、动物和人物造型。陈设的方式主要有下列三种：其一是置于多宝格内，与其他器物组合陈设。这

